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翻译 ——基于汉文、藏文、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研究

励 轩

(1.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2. 四川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翻译是“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进入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的关键一环。早在民国时期, 将“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翻译为少数民族文字的工作即已开始, 如《蒙藏周报》1930年就已将“中华民族”一词翻译成藏文, 但历史上首次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进行大规模系统和完整的少数民族语文翻译, 则是伴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少数民族文字版翻译工作启动而展开的。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要平衡中华民族的整体地位和各个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 因此在概念翻译中既突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感, 又明确了对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的承认。同时, 中国共产党当时已认识到需要处理民族认同的多层次性问题, 因此在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中通过特别的翻译手法明确了作为高一层次的中华民族与作为低一层次的具体民族之间的差别。《毛泽东选集》翻译工作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传播意义重大而深远, 通过将《毛泽东选集》翻译为少数民族文字并在民族地区大规模发行少数民族文字版《毛泽东选集》, 事实上有助于少数民族群众初步形成中华民族具有一体性和多元性的认识。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 中华民族; 民族; 翻译

[中图分类号] D633;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22) 02-0027-12

DOI: 10.15970/j.cnki.1005-8575.2022.02.005

作为凝聚现代中国国民整体认同的术语, “中华民族”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学界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史研究也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 这些成果大多集中在“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及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流变^①, 也有一些成果从话语变迁的角度系统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中“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1]-14}。但以上成果主要基于对汉文文献与材料的分析, 有关现代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在

少数民族文字中传播的情形则研究不足^[2]。而搞清楚“中华民族”相关概念在少数民族文字中的传播意义极为重大, 有助于我们理解多民族国家如何塑造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中华民族”相关概念传播的各个环节中, 翻译无疑是最为核心的一环。借助翻译, 汉语中的“中华民族”观念进入少数民族文字中, 被少数民族群众逐渐熟知。同时, 翻译本身也是对文本再创造的过程, 国家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使处在不同语言环境

[收稿日期] 2021-11-10

[作者简介] 励轩,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秘书长。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近代东部藏区商业贸易中藏族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研究”(项目编号: 20VMZ005)、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体系中的演进及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 2021-GMB-002)的阶段性成果, 获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基金资助。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 黄兴涛. 重塑中华: 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郑大华. 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民族主义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励轩.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精英关于中华民族建设问题的讨论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2): 18-25; 石硕. 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3): 1-12.

的各个少数民族都可以理解和接纳同一概念，相关概念的传播才称得上成功。本文即以笔者搜集到的汉文、藏文、维吾尔文各版本《毛泽东选集》为基本材料，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翻译以及如何在不同语言环境的文本再创造过程中尝试确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认识。

一、印刷资本主义与文本翻译

印刷资本主义 (Print Capitalism) 对现代民族主义建构和民族共同体凝聚具有重要意义。该理论是美国学者本尼迪科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1983 年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中提出的关于民族主义的一套现代论解释体系。在安德森之前，部分学者早已注意到印刷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 (Harold Innis) 1950 年就提出印刷工业的扩张强化了民族主义^[3]。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则进一步阐述了印刷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印刷促进了民族主义并且破坏了民族间传播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因为出版商发现地方语言受众规模庞大且更有利可图^[4]。安德森则将印刷、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三者系统地整合起来，发展出了印刷资本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现代民族 (Nation) 的形成与约翰内斯·谷登堡 (Johannes Gutenberg) 15 世纪中期活字印刷机的发明有关。活字印刷机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更为便捷地印刷出利用地方语言 (Vernacular Languages) 书写的书籍和报纸，从而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利用拉丁文形成的知识垄断。资本主义则加速了地方语言的扩散，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的逻辑意味着一旦精英的拉丁文市场饱和，潜在而庞大的单一语言大众市场将会招手^[5]。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民众识字率大幅度提升，印刷的成本则在降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阅读到相同地方语言书写的书籍和报纸，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以更为深刻的新方式思考自身，并将他们自己与他者联系起来。同时，印刷资本主义不仅打破了拉丁文的垄断地位，也促使多样性的地方语言 (Vernacular Languages) 逐渐演变

为统一的国家/民族语言 (National Languages)，而以相同语言获取相同信息的人们开始想象自己属于同一个共同体，这推动了民族意识以及现代民族的产生。

印刷资本主义理论不仅可以解释现代民族的产生，在解释欧洲民族国家的行为逻辑时也能发挥不小的作用。民族国家是遵循一族一国原则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欧洲民族国家在二战后有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即越来越强调民族的国民政治共同体地位而淡化其种族性或文化性。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在其著作中主张，民族成员的共同性并不在于族性 (Ethnicity) 和语言 (Language) 等^[6]。去民族化当然有助于消解一族一国的原则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真正实现过文化一致性的现实之间的张力，但二战后欧洲民族国家的去民族化并无法遮掩这些民族国家在近现代历史上曾对这种文化一致性的追求。而印刷品则恰恰是这些欧洲民族国家追求文化一致性的工具。为了实现内部的文化一致性，民族国家需要形成统一的国家/民族语言 (National Languages)，这就驱使国家同化多样性的地方语言。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机制。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很快进行了传统行政区域的重组，完全不顾当时少数民族聚居的现实，拆分了布列塔尼、巴斯克、阿尔萨斯、加泰罗尼亚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行政区域。在完成行政区划改造后，法国政府又将语言统一提上日程。根据政府的调查，18 世纪 90 年代初，法国 83 个省份中只有 15 个省使用法语。在法兰西民族主义者眼里，统一的法兰西民族只能拥有一种语言——法语，语言多样性的现实与民族国家文化一致性的要求是矛盾的，所以由民族主义者所掌控的法国政府自然要推行语言同化政策。这种语言同化政策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达到了高潮，根据当时颁布的教育法，所有法国儿童必须在学校统一接受法语教育，而地方语言则在学校教育中被全面禁止。通过这种强制同化的方式，法兰西民族国家确立了法语在国民生活中的统治性和排他性地位^[7]，成为实现文化一致性的标志。在法语成为国家/民族语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学校教育使用的教科书以

及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书籍等印刷品都是最为重要的工具。除了法国，文化上同质性更为显著的德国在二战结束前都未曾放弃对文化一致性的追求，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阶段，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强力推行德意志化（Germanization）政策，提倡德意志语言与文化的扩散，禁止境内的非日耳曼人使用母语及维持其文化传统。作为德国的少数民族，索布人在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时期就曾遭到德意志化的压力，而在纳粹德国时期，针对他们的德意志化政策变本加厉，不仅索布语出版物遭取缔、在公共场合使用索布语遭禁止，官方还系统性地将索布人教师、学者和牧师等知识阶层从索布人地方学校和机构赶出，从而达到消灭索布人文化以实现彻底同化的目的^[8]。借助印刷资本主义追求文化一致性是欧洲民族国家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性，甚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有别于法、德等欧洲典型民族国家的移民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也曾以“文明化”（Civilization）名义对原住民实施残酷的同化政策^[9]。

印刷资本主义在西方影响巨大，已经成为一种通用概念，国内也有学者将之运用到研究中。但是，印刷资本主义并不是普世真理，并不能充分解释一些多民族国家的行为逻辑。不像近现代欧洲民族国家要以同化地方语言为代价来明确国家/民族语言的统治性和排他性地位，部分多民族国家在肯定族际通用语言^①重要性的同时，也会保护非主体民族传统上所使用的语言。特别是对于新中国而言，简单套用印刷资本主义理论就会有一些突兀。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承认境内存在多个民族，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10]。而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进一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11]。无论是《共同纲领》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均规定了使用和发展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以及尊重和保护其文化习俗的条款。这

与西方国家在近现代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强制同化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与近现代历史上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同，印刷在新中国成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有力工具。党和政府积极推动官方文件的翻译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材、书籍和报刊编写出版工作，保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个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其语言文字的权利，繁荣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

对中国这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而言，翻译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战略。通过翻译官方文件以及领导人讲话，国家不仅可以将自己的意志传递给少数民族，还能够在少数民族知识群体中形塑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翻译工作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1955年专门成立了从事少数民族语文翻译的机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②，承担党和国家重大会议的民族语文翻译和同声传译工作以及马恩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大会议文献文件、法律法规的翻译^[12]。由于翻译在实现民族团结方面的突出作用，从具体文本翻译入手探究如“中华民族”一类重要的政治概念在少数民族文字中的传播就变得极有意义。通过对各种语言文字“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搞清这些概念是如何进入少数民族文字的。同时，翻译过程本身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而研究文本再创造的过程，还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国家是如何在不同语言环境中使各个少数民族理解和接纳同一概念的。

二、《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字版翻译工作及相关版本考订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在党的创建与发展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长期担任国家主要领导人，直接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以说，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深深打上了毛泽东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的内容包括毛泽东写于这两个时期的大量重要著作，是以毛泽东为核心

① 通常是主体民族所使用的语言。

② 即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局）的前身。

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思想的具体呈现，是了解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把“钥匙”。如果要评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内最有影响力的一套著作，那无疑是《毛泽东选集》。对于民族理论研究而言，《毛泽东选集》也具有非凡意义，其收录了毛泽东涉及民族工作的数篇重要文章和讲话，是我们认识与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重要参考。鉴于毛泽东著作的重要影响，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区就曾多次编选出版《毛泽东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更是被当成党和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来实施。195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编选、注释和整理工作。次年，中央出版总署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工作委员会，负责联系、督促和检查工作。在两个委员会的推进下，《毛泽东选集》1至4卷汉文版先后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1953年4月和1960年9月出版。

在第1卷汉文版出版后，党和政府对《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也随即展开，并在20世纪60年代陆续完成了四卷本蒙文版、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藏文版、朝鲜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由于当时北京的翻译力量和条件有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和朝鲜文版《毛泽东选集》由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领导下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翻译，而藏文版《毛泽东选集》则主要由民族出版社藏文翻译室负责翻译，各少数民族文字版《毛泽东选集》翻译完成后均交由民族出版社和各家民族地区出版社出版^{[13] 42-43}。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进行文字改革后，又曾分别重新翻译出版和改写出了维吾尔新文字版与哈萨克新文字版《毛泽东选集》^[14]。笔者近年陆续收集了汉文、藏文、维吾尔文各版本《毛泽东选集》，由于学界之前对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版本考订的研究较多且详细，本文不再赘述，在此将只介绍藏文版和维吾尔文版。

藏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于1959年9月翻译出版，对应的是1951年10月出版的汉文

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藏文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于1960年6月翻译出版，对应的是1952年4月出版的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藏文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于1965年8月翻译出版，对应的是1953年4月出版的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藏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于1964年6月翻译出版，对应的是1960年9月出版的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一版全四卷都是民族出版社负责翻译出版，其中第1卷和第2卷由民族出版社发行、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第3卷和第4卷由新华书店发行、民族印刷厂印刷。此外，笔者还收藏了根据1967年10月第二版改排，并在北京于1969年2月第2次印刷出版的一套藏文版《毛泽东选集》，该套藏文版《毛泽东选集》根据人民出版社1968年12月印刷本对藏文译文进行了修订，由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新华书店发行，第1卷和第2卷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第3卷和第4卷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藏文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于1977年7月翻译出版，对应的是1977年4月出版的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民族印刷厂印刷。根据笔者对第一版和第二版《毛泽东选集》藏文译文的对勘，第二版确实与第一版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如把第一版中的“仲家人”（ལྷོ་མེད་）^[15]改成了“布依族”（བུམ་ལུང་）^{[16] 481}，第二版中的“中国共产党”（ལྷོ་མེད་ལྷོ་ལྷོ་ལྷོ་）藏文译名在“中国”（ལྷོ་ལྷོ་）与“共产党”（ལྷོ་ལྷོ་ལྷོ་）之间增加了属格འ་，表明ལྷོ་ལྷོ་ལྷོ་ལྷོ་ལྷོ་为“中国的共产党”之意。

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于1957年1月翻译出版，对应的是1951年10月出版的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译自人民出版社1955年2月北京第一版（重排本）第8次印刷本；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于1959年9月翻译出版，对应的是1952年4月出版的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译自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北京第一版（重排本）第14次印刷本；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于1963年10月翻译出版，对应的是1953年4月出版的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译自

人民出版社1961年1月北京第一版(重排本)第19次印刷本;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于1962年8月翻译出版,对应的是1960年9月出版的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译自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1次印刷本。第二版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由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对译文进行了校订,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于1965年9月出版。笔者收藏有第二版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1965年第2次印刷的第1卷和第2卷以及1965年第3次印刷的全四卷。负责第二版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的印刷厂有两家,第1卷和第2卷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第3卷和第4卷则是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笔者还收藏有“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全套维吾尔新文字版《毛泽东选集》,该套《毛泽东选集》的第1卷、第2卷和第3卷均根据民族出版社1968年第二版北京第3次印刷出版的维吾尔文版进行转写,第4卷根据民族出版社1969年第二版北京第4次印刷出版的维吾尔文版进行转写,并在排印时对译文进行了修订^①。维吾尔新文字版《毛泽东选集》于1971年8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民族印刷厂印刷。笔者对勘第二版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和维吾尔新文字版《毛泽东选集》,发现后者虽然是根据前者的内容字字对应转写,但极个别字词还是有所区别。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领土”一词由西文借词 تېررىتورىيە 改成了本土词汇 zimin^{[17]621, [18], [19]}。民族出版社于1977年7月出版了维吾尔文老文字版及新文字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译自1977年4月出版的汉文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至此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五卷本都已出齐。维吾尔文老文字版及新文字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除了字母不同,内容都一样,均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不过新文字版是由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老文字版是由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1992年7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1至4卷,此次再版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根据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汉文《毛泽东选集》北京第1次印刷本,对译文作了校订,对新增和改写的题解及注释部分进行了翻译。根据笔者对勘第三版与第二版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及维吾尔新文字版《毛泽东选集》,发现第三版内容与后两者差不多是一样的,但个别字词的翻译有区别。第三版更接近维吾尔新文字版《毛泽东选集》,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领土”一词继续使用了本土词汇 زېمىن (zimin)^②而非西文借词 تېررىتورىيە。但第三版把第二版及维吾尔新文字版中“共产党”的汉语音译 گۇگۇچىمىنداڭ 改成了西文借词 كوممۇنىستىك پارتىيە。又如“节”在第二版中用的是 بۆلۈم 一词,“差不多”在第二版中用的是 دېگىدەك 一词,在第三版中分别改成了 بۆلۈم 与 دېگۈدەك^{[20]1232}。

三、藏文版《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华民族”等相关概念的翻译

藏文中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华”与“民族”两词最晚在民国初年即已出现。1913年由北洋政府所创办的《藏文白话报》以汉、藏双语刊登政府法令、政令和政论文章,因“中华民国”包含“中华”一词且“五族共和”为民国初期的基本国策,彼时政府的各种政令中常会出现“中华”及“民族”两词,所以我们可以从《藏文白话报》上找到两词的藏文翻译^[21]——“中华”用汉文音译的 ཇུང་ཁྲུང་,在藏文中并无具体意思,“民族”则采用了藏文中早先就有的一个词汇 རིགས་, རིགས་ 在藏文中有“人”“民”的意思,རིགས་ 则有“种”“类”“族”之意,合起来非常接近“民族”本义。但《藏文白话报》中并未将“中华民族”合起来翻译^③。由于孙中山1919年之

① 有学者曾指出维吾尔新文字版《毛泽东选集》是根据人民出版社1969年4月的汉文版重新翻译出版的,参见:潘德利.《毛泽东选集》版本概览[J].国家图书馆学报,2000(2):77。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② 实际上该词最早也是外来的,可能是波斯语借词,源自波斯语的“土地”(زمین)一词。

③ 《藏文白话报》汉文版中出现过“中华民族”一词,但在藏文版中却未见翻译。参见:约法浅说[C]//《边疆民族旧刊续编》编委会.边疆民族旧刊续编·西南边疆·上·一.影印本.合肥:黄山书社,2013:514。

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17]⁶²²这句话时，各个少数民族的具体族名后面均未添加“民族”（མི་རིགས）或“族”（རིགས），而是直译成了མོག་པོ་（蒙古）、ལྷོ་ལོ་（回）、བོད་（藏）、ལུ་ལུ་（维吾尔）、མེད་（苗）、དབྱིས་（彝）、རྩོང་（壮）、ཡུའུ་（布依）、ལོ་ལོ་（朝鲜）。在藏文版《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种译法较为常见，第二种译法则有一定特殊性，需要在句子后面加“等少数民族”的修饰。当然，上述两种译法中对“民族”的策略性处理不意味着否认或忽视各民族的民族地位，事实上，藏文版《毛泽东选集》在多处译文中都明确了各民族的民族地位。比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有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藏文版中是将其译为：

གུང་ལོ་ནི་མི་རིགས་མང་པོ་མཉམ་འབྲེལ་བྱས་ནས་ཆགས་པའི་

རྒྱལ་ཁབ་མི་གྲངས་ཉ་ཅང་མང་པོ་ཡོད་པ་ཅིག་རེད།，其中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多数民族”翻译成了མི་རིགས་མང་པོ་，即许多民族，明确了各民族具有མི་རིགས（民族）地位^[16]⁴⁸¹。

除了翻译中华民族以及为了明确各民族的民族地位时会将“民族”译为མི་རིགས，藏文版《毛泽东选集》还会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将与“民族”有关的术语翻译成མི་རིགས。通过对文本的检视，笔者发现了几处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译法，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28]这里的“民族资产阶级”被译为了མི་རིགས་འབྱོར་ཐོན་ལས་རིམ་^[29]，མི་རིགས即民族，འབྱོར་ཐོན་ལས་རིམ་即资产阶级。由于མི་རིགས在藏文版《毛泽东选集》中通常被用在对中华民族（ལྷན་དྲུག་མི་རིགས）的翻译中，对于普通藏族读者来说，看到མི་རིགས་འབྱོར་ཐོན་ལས་རིམ་会联想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资产阶级而非各民族中某一具体民族的资产阶级。第二是“全民族”的译法，在《你们是全民族的模范人物》一文中，“全民族”一词被译成了མི་རིགས་ཉིད་པོ་^[30]，ཉིད་པོ་在藏文里是“整个”

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整个民族。即使该文中没有出现“全中华民族”（ལྷན་དྲུག་མི་རིགས་ཉིད་པོ་）一词，读者也能明白这里的“全民族”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各民族中某一具体民族。第三是“少数民族”的译法，藏文版《毛泽东选集》将“少数民族”译为གངས་ལུང་མི་རིགས，གངས་ལུང་即为少数之意。在解释“少数民族”时，藏文版《毛泽东选集》是将除汉族以外的各个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གངས་ལུང་མི་རིགས），而“少数民族”（གངས་ལུང་མི་རིགས）和占人口多数的“汉族”（བོད་རིགས）就构成了中华民族（ལྷན་དྲུག་མི་རིགས）^[16]⁴⁸¹。诚然，《毛泽东选集》所收录的都是历史文献，有些表述放在当下的语境难免会显得逻辑不自洽，藏文版的翻译也难做到十全十美，只能尽力弥合。比如《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一文中有一句话“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31]，这里的“西藏民族”定义问题可能会引起歧义，藏文版《毛泽东选集》在翻译该词时选择了直译，将之译为བོད་རྫོང་མི་རིགས，即西藏民族，避免了其他译法可能引起的争论^[32]。

四、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华民族”等相关概念的翻译

维吾尔文中表示“中华民族”的词汇曾有两种形式：جۇڭخۇا مىللىتى（中华民族）^[33]和 جۇڭخۇا مىللەتلىرى（中华诸民族）^[34]。جۇڭخۇا是汉语“中华”的维吾尔文音译，مىللىتى（民族）的原型为مىلەت（millet），在突厥语族的语言中是广泛使用的。专治土耳其历史的笄涛在一篇论文中转引 Brill 出版社的在线《伊斯兰百科全书》指出，millet 源自阿拉伯语 milla，奥斯曼土耳其语中就有该词，有三个含义：宗教（Religion）、宗教共同体（Religious Community）和“民族”（Nation）^[35]。当然，如果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 millet 理解为现代民族（Nation）是不精确的，它很可能只是更为普遍意义上表示人们共同体的“人民”（People）或者说古代民族。也有学者认为，在 20 世纪以前，突厥语族的作家和历史学家通常在族群上异质的宗教共同体或单纯的共同体两个维度使用 Millet 一词，Millet（مىلەت）

在维吾尔语中被用来指称现代民族 (Nation) 和民族 (Nationality) 应该是与 20 世纪初对世界有一定了解的维吾尔族^①知识分子有关。至 20 世纪 30 年代, 具有现代民族 (Nation) 和民族 (Nationality) 含义的 Millet (مىلەت) 已经被维吾尔族知识阶层广泛接受^[36]。维吾尔语与汉语和藏语不一样, 它的名词单复数是异形的, 犹如英语中的复数通常在词尾加一个 “s”, 维吾尔语名词在表示复数的时候通常也会加一个词缀 لار 或 لەر。所以, 维吾尔文 “中华民族” 第二种形式中的 مىلەتلەر 是一个复数, 直译过来是 “诸民族” 或 “各民族”, 而 جۇڭخۇا مىللەتلىرى 其实是 “中华各民族” 的意思。也就是说, 维吾尔文中表示 “中华民族” 词汇的两种形式分别代表了象征一体的单数中华民族和象征多元的复数中华民族。维吾尔文的 “中华民族” 出现两种形式, 一方面与维吾尔文特有的语法规则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共产党对 “中华民族” 的理解有关。中国共产党认为 “中华民族” 是包含一体和多元的民族复合体, 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其民族话语是比较偏重 “中华民族” 的多元特性的, 在对国民党就中华民族宗族论的批判中, 党的理论家甚至直言 “中华民族” 事实上就是指中华各民族^{[1]3}。

在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中, “中华民族” 没有译成其复数形式 جۇڭخۇا مىللەتلىرى (中华诸民族), 而是一直用单数形式 جۇڭخۇا مىللىتى (中华民族),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译者要突出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用意。不过, 总的来看, 《毛泽东选集》中明确使用 “中华民族” 一词的地方是比较少的, 在更多地方是用如上文曾提到的 “民族资产阶级” 这样的术语, 读者在大多数语境下可以将这里的 “民族” 理解为 “中华民族” 的省称。与藏文不同的是, 维吾尔文的名词作为形容词使用时, 词缀也会发生变化。如 “民族资产阶级” 一词的译文, 在藏文中是 མི་རིགས་འབྲུག་ལྷན་ཁག་རིམ, 直译过来也是 “民族资产阶

级”, 而维吾尔文是 مىللىي بۇرژۇئازىيە^[37], 其中 مىللىي 是 “民族” (مىللەت) 的形容词形式, بۇرژۇئازىيە 是西文 “资产阶级” (Bourgeoisie) 借词, 那么维吾尔文的 “民族资产阶级” 其实是 “民族的资产阶级” 之意。维吾尔文这一语法规律使得读者更能明白这里的资产阶级是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当然, 并非所有术语中包含的 “民族” 都是 “中华民族” 的省称, 这里要考虑两种情形: 一是涉及对外指称, 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出现了 “民族矛盾” (مىللىي زىددىيەت) 一词, 通过阅读上下文可以发现, 这里的民族矛盾是指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之间的矛盾, 而非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的矛盾^[38]; 二是涉及国内各民族的指称, 如《毛泽东选集》中经常出现的 “各少数民族”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لەر) 一词, ئاز 是少的意思, سانلىق 是数量的意思, مىللەتلەر 是民族的复数形式, 读者可以很明确地认识到这里的 “民族” (مىللەت) 不是指中华民族而是国内的各民族^[39]。这里有必要再说明一下关于 “少数民族” 一词的翻译, 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1 至 4 卷中的 “少数民族” 被译为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 其实就是 “各少数民族”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لەر) 的单数形式, 而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中的 “少数民族” 则译成了复数形式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لەر。这里的单数 “少数民族”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 也许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该词是对汉文 “少数民族” 的字字对应翻译, 另一方面该词中的 “民族” (مىللەت) 可能并不是指国内各个少数民族而是指中华民族。更确切地说, 单数 “少数民族”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 似乎更应作为英文中的 National Minorities (民族中的少数群体) 来理解。“少数民族” 单复数形式的区别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两个术语背后不同的翻译逻辑。如果说 “少数民族” 的复数译法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لەر 强调的是对中国多民族结构的承认, 那么 “少数民族” 的单数译法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 则还突出了各个少数民族都属于中

^① 需要说明的是, 20 世纪初并没有 “维吾尔语” 或 “维吾尔族” 这种概念, 甚至 “维吾尔” 都还没有成为正式的族称, 此处使用 “维吾尔语” 或 “维吾尔族” 只是为了叙述方便。

华民族这一整体的认识^①

正如在探讨“各少数民族”的翻译时看到的，与汉文及藏文一样，维吾尔文里表示各民族中具体的某一个“民族”所使用的与中华民族中的“民族”是同一个词 **مىللەت** (Millet)，所以维吾尔文与汉文及藏文一样，也存在着两个“民族” (**مىللەت**) 并用的现象。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在处理两个“民族” (**مىللەت**) 并用问题的时候，不可能像藏文那样，在称各民族中某一具体民族时省略“民族” (**مىللەت**) 中的第一个字“民” (**مى**)，而只保留后一个字“族” (**تەڭرى**)。因为藏文中的 **མི་རིགས་** (民族) 是由 **མི** (民) 和 **རིགས་** (族) 两个字组成的词，而维吾尔文中的 **مىللەت** (民族) 这一单词是不可以拆分的。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完全换了一个思路，对于部分民族，使用原有的惯称，如维吾尔族就直接称 **ئۇيغۇر** (维吾尔)，蒙古族就直接称 **موڭغۇل** (蒙古)，由于 **ئۇيغۇر** (维吾尔)、**موڭغۇل** (蒙古) 在维吾尔语里也分别有“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的含义，实际上并不太影响维吾尔族读者把这两个单词理解为表示人们共同体的维吾尔族和蒙古族。对于其他大部分民族，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中使用的是加一个汉语“族”字音译词缀的方式来表示“某族”或“某某族”。如“汉族”译成了 **خەنزۇ**，这里的 **خەن** 就是“汉”的汉语音译；**زۇ** 就是“族”的汉语音译，又如“藏族”译成了 **زاڭزۇ**，这里的 **زاڭ** 就是“藏”的汉语音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汉文版《毛泽东选集》在指称“某族”或“某某族”时，多以“某人”或“某某人”代替，如“汉人”“藏人”“回人”等，而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通常就翻译成了 **خەنزۇ** (汉族)、**زاڭزۇ** (藏族)、**خۇيزۇ** (回族)^{[20] 1234}。当然，在某些特殊的翻译场景下，还会出现“某族”后面再加一个“民族”的现象，但这并不等于是在树立一个与“中华民族”同一个层次的具体民族形象。在维

吾尔文版《论联合政府》中有这样一个表述 **موڭغۇل، خۇيزۇ مىللەتلەر**^{[40] 2097}，直译过来就是“蒙古、回族民族们”，汉文原文的句子则是“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41] 1084}，综合汉文和维吾尔文版本，可发现译者在表达的是蒙古族和回族这两个“民族们”。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在通常情况下不在具体民族后面加“民族” (**مىللەت**)，是为了突出中华民族 (**جۇڭخۇا مىللىتى**) 的高层次性，但与藏文版《毛泽东选集》一样，译法中的这一策略性处理方式并不等于否认各民族的民族地位。相反，与藏文版一样，维吾尔文版在多处译文中都肯定了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 (**مىللەت**) 地位。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批评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政策，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41] 1083-1084} 在维吾尔文版中，“各少数民族”被翻译成了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لەر**，均使用了“民族” (**مىللەت**) 这个词^{[40] 2095}。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一文中，毛泽东提出解放军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42] 在翻译“各少数民族”时，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中再次使用了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لەر** 这一术语^[39]。以上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翻译中向维吾尔族读者一再确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具有“民族” (**مىللەت**) 地位。

五、结论

印刷资本主义理论并非是普世的，它能够帮助人们理解近代以来一些民族国家地方语言被国家语言取代的过程，但无法解释一些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的力度。中华

^① 不过，日常使用中，将“少数民族”译为单数形式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 容易引起对中国民族结构的误解，因此通常是采用其复数形式 **ئاز سانلىق مىللەتلەر**。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中将本该是复数的“民族” (**مىللەتلەر**) 译为单数“民族” (**مىللەت**) 的例子还有一些，如第3卷《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出现“多民族”一词，该词意思应为“许多民族”，是复数，在维吾尔文版中直译成了 **كۆپ مىللەت**，没有把“民族”一词的复数形式表示出来，由于文中“多民族”并不是指中华民族中的多数群体 (汉族)，因此用突出中华民族整体性来解释这种译法就会显得牵强，这一译法实际上更容易引起误解。参见：**ماۋزېدۇڭ بېرەشەھە مۆكۈمەت مەقسەدە، ماۋزېدۇڭ تالاندا ئۈچۈنچۈن 3-توم، مىللەتلەر نەشرىياتى، 1992-يىل، 2095.**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列宁民族平等思想指导下的苏联就曾致力于保护境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甚至为一些没有书面语言的少数民族创造书面语言,与同时期仍在倡导和实施同化主义的一些欧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苏联史专家泰瑞·马丁(Terry Martin)因此把苏联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平权帝国(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43]。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虽然与苏联存在着很多差别,但的确在一定时期内深受列宁民族平等思想的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中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肯定了境内各民族的民族地位及其政治权利,在语言政策领域,一方面重视推广具有族际通用语地位的汉语普通话,另一方面并没有简单地用国家通用语取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是采取了尊重和保护的姿态。

由于中国存在多个民族和多种语言,为了在各民族之间实现跨语言的顺畅沟通,翻译很多时候就会被上升到政治高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最重要的文化工程之一,党和政府对《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工作高度重视,译者队伍中云集了当时各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以求在经过文本翻译的再创造过程之后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

与政策。费孝通1988年用“多元一体格局”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这是学界普遍的共识,有学者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即已形成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初步认识^{[25]24}。而本文进一步证实党和国家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树立一种“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的实践。通过对藏文、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中“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分析,我们发现党和国家的这种意志传导到了翻译工作中,因此在文本再创造过程中既会突出中华民族的整体感,又会明确对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的承认。此外,中国共产党当时已认识到需要处理民族认同的多层次性问题,在翻译过程中通过特别的处理手法明确了作为高一层次的中华民族与作为低一层次的具体民族之间的差别。《毛泽东选集》翻译为少数民族文字版本后,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其出版发行工作,其单行本至1960年底已出版302万册。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推动下,民族地区一再掀起全民学习《毛泽东选集》的高潮^{[13]44-46}。伴随着《毛泽东选集》在民族地区的大量发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得以首次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广泛传播,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 [1] 励轩.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百年演进历史[J].民族研究,2021(3):1-14+139.
- [2] 黄兴涛.深化中华民族自觉史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民族研究,2020(6):9-13.
- [3] INNIS H A.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M]. Victoria: Press Porcepic Limited,1986: 167.
- [4] MCLUHAN E, ZINGRONE F. Essential McLuhan [M]. London: Routledge,1997: 54.
- [5]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M]. London: Verso, 2006: 38.
- [6] HOBBSAWM E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
- [7] 陈玉瑶.法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及其“自我管理”模式[J].贵州民族研究,2020(11):15-20.
- [8] FOY T, THIELE C.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sorbian minority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1996,4(1):46-51.
- [9] 励轩.超越灯塔主义:美国种族与族群政策再认识[J].文化纵横,2021(2):62-70.
-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 [EB/OL]. [2021-08-17]. <http://www.cppcc.gov.cn/2011/12/16/ART11513309181327976.shtml>.
- [1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EB/OL]. [2021-08-17].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

**The Translat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Research o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in Han Chinese,
Tibetan, and Uyghur Languages**

LI Xuan^{1,2}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2. Research Base for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key element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the Chinese ethnic languages. As early a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work of translating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Chinese nation” into ethnic language had begun. For instance,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Weekly* translated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Tibetan in 1930. However, the first large-scal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ethnic languages in history was carried out with the launch of the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During its translation, the CPC noticed the need to balance the overall status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special status of ethnic groups, therefor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ncepts not only highlighted the sense of whol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acknowledged the statu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CPC also seemed to be aware of the need to deal with the multilevel issue of ethnic identity.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recreation of the tex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higher level and the specific ethnic identity as a lower level are made clear through special translation techniques. The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mong ethnic people. Indeed, the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into ethnic languages and its large-scale distribution in ethnic regions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ethnic people to acquir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Chinese nation; ethnic group;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徐姗姗]